

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

胡厚宣著



人民百科小冊

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

胡厚宣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(94213·1)

人民百
科小冊 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

★ 版權所有 ★

著 作 者 胡 厚 宣

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

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及各地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1950年6月初版 基價2.2元

目 錄

一	三十年來中國的新史學·····	1
二	新史學的新時代·····	6
三	史料和史觀·····	7
四	典籍史料的真偽和年代·····	10
五	考古史料的徵引和解說·····	18
六	甲骨文不同的解釋·····	29
七	甲骨文錯誤的學說·····	38
八	甲骨文被揚棄了的論斷·····	46
九	甲骨文成語和單字的研究·····	50
十	粗心的援引·····	53
十一	非法的推論·····	57
十二	不要太忽略了材料的問題·····	61

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

一 三十年來中國的新史學

中國的文化革命，發生在最近三十年。大略可以分作五個時期。第一，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，是五四運動時期。第二，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，是革命北伐時期。第三，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，是人民革命時期。第四，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，是抗日戰爭時期。（註一）第五，從一九四五年到現在的一九四九年，是解放戰爭時期。從一九五〇年以後，解放事業完成，就應當走上新的文化建設的大路了。

中國的新史學，如所謂疑古，考古，釋古三大潮流，也是最近三十年的事。（註二）疑古考古偏重史料。疑古是舊史料的鑒定，考古是新史料的開發。釋古偏重史觀，旨在應用馬列主義的經濟觀點，以說明歷史發展的意義。其中尤以最後釋古一系，是歷史學的真正目的，也是近三十年來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。（註三）

三十年來，以唯物史觀作中國社會經濟歷史的探討，所謂釋古之學，可以分爲六個階段。

第一是草創的階段。因爲時代文化的啓發，首先應用經濟史觀作中國史的嘗試研究。這可以新潮雜誌上李守常的物質變動與精神變動一文，與建設雜誌上胡漢民的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，孟子與社會主義，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諸文，（註四）和他同胡適，廖仲愷，朱執信，季融五，呂思勉等討論井田制度的許多文章（註五）作代表。

第二是概說的階段。採用唯物史觀，對中國的社會經濟，作一通論式的史的分析。這可以陶希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，中國封建社會史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，中國社會之回顧與展望，周谷城的中國社會之結構，中國社會之變化，熊得山的中國社會史研究，吳貫因的中國經濟史眼以及散見於新生命，雙十，前進，讀者，先導，革命評論，理論與批判等刊物上梅思平，梁園東，朱伯康，公孫愈之，朱鏡我，王學文，吳黎平等的文章作代表。

第三是研究的階段。由通論概說，進而作一較深的探討。可以引作代表的，有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，嚴靈峯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，任曙的中國經濟研究和馬札

亞爾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。尤以郭氏之書，在學術界曾發生了極大的影響。

第四是論戰的階段。由於各家通論說法之不同，研究結果之或異，就產生了一個熱鬧的論戰階段。先有新思潮派和動力派的對壘。後有讀書雜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四個特輯。其他散見於文化雜誌，文化批判，綜合雜誌，現代史學，二十世紀，社會科學，歷史科學等刊物上的文章，也有很多。戰興最濃的脚色，先有朱其華和嚴靈峯，後有李季和王宜昌。他如王禮錫，胡秋原，杜畏之，陳邦國，孫倬章，劉鏡園，王伯平，王亞南，張橫，戴行軺，周紹濤，劉夢雲，劉蘇華，劉興唐，王興瑞，丁迪豪，任曙等，也都是常顯身手的英勇戰士。

第五是搜討的階段。經過一場熱烈的論戰之後，大家多感覺「空洞的爭辯，反而得不到正確的結果，」「豐富的材料，纔是犀利的戰具，」「現在誰都感到缺乏材料的毛病。」（註六）於是偃旗息鼓，返回頭來，從新再作史料的搜集與研究。代表這一種風氣的，在南方有中國經濟，出了兩大本中國經濟史專號，號召說「一分見解，一分材料；一分材料，一分見解。」（註七）在北方有食貨半月刊，「創刊的任務，主要偏重史料之蒐集。」編者說，「有

些史料，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，不能認識，不能評定，不能活用；也有些理論和方法，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，不能證實，不能精緻，甚至於不能產生。」（註八）

此外主要的學者，像郭沫若，自從發表了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後，就專在甲骨金文方面作研究。先後作有甲骨文字研究，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，卜辭通纂，殷契粹編，兩周金文辭大系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，金文叢考，金文餘釋之餘，古代銘刻彙考正續編等書。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，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和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，也是儘量利用舊籍和地下的豐富材料，來作的研究。（註九）

第六是沉寂的階段。自從一九三七年，發生了抗日民族戰爭，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之後，隨着又發生了人民解放戰爭。前後十四年的時光，被這偉大的兩大革命戰爭佔去了。蓬蓬勃勃方興未艾的中國新史學，遂不能不暫時成了寧靜的狀態。

在這長長的十四年中，不像從前那樣活躍了，慢慢的僅有一些整理的研究，主要的像郭沫若的十批判書，青銅時代，今昔蒲劍，屈原研究；翦伯贊的中國史綱，中國史論集，歷史哲學綱要；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，中

國原始社會史，中國社會史綱，中國社會史諸問題；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，中國古代社會史，中國古代學說思想史，中國近代學說思想史，中國思想通史；吳澤的中國原始社會史，中國社會簡史，中國歷史簡編，古代史；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，中國政治思想史；周谷城的中國通史；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；朱伯康的中國經濟史綱；余精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；和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。以及此外散見在各雜誌上的論文。

這長長的十四年，如果不是戰爭，那，中國新史學的進步，一定決不止此。在努力搜討研究之後，一定會有更燦爛的果實。

二 新史學的新時代

但，這不過是暫時的沉默而已。我們看，今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。明年，一九五〇年，解放事業就要全部完成。眼前是一個極光明的偉大時代。國家的一切，都要走上和平的建設。中國的新史學，也就要進入一個劃時代的時期了。

今後的新史學，馬列主義的唯物觀點，將要更明朗而正確。歷史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，是生產方式的變更。生產方式的變更，首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上開始。這一切都不會再有問題。從今以後，只有應用馬克斯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中國歷史，才是唯一正確的立場與方法。（註一〇）舊的唯心的形而上的歷史方法，將要逐漸的被揚棄。

三 史料和史觀

固然，在史觀方面，近年來，我們是有了極大的進步，今後，因為偉大時代的啓示，將要更明朗而確實。

不過，有一種偏向，必須避免，那就是過度的忽略了材料的問題。

史料與史觀是史學的兩個方面，並不是對立的兩種學說。史料與史觀，必須共同相輔，才能成為史學。史料與史觀，是一件東西的兩種成分，任何一種是不能脫離了另外一種而獨立了的。

史學若是房屋，那麼，史觀是工程師，史料是木材磚瓦。只有工程師而沒有木材磚瓦，和只有木材磚瓦而沒有工程師，是同樣蓋不成房子的。只有正確的史觀，沒有正確的史料，和只有正確的史料，沒有正確的史觀，是同樣寫不出正確的歷史來的。

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許多學說，都是科學的真理。他們是根據了豐富的正確的材料，所得的偉大發明。我們把他們的學說引用到中國，如果不能有充實精當的材料作印證，只把它當作空洞的公式和教條，那便犯了錯誤。

毛主席說：「馬列主義是科學，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、問。科學的態度，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。而要這樣做，就須不憑主觀想像，不憑熱情，不憑書本，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，詳細佔有材料，從這些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。這種結論，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，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，而是科學的結論。」（註一一）

蔡元培說：「研究史學，首當以材料爲尙。」「史學，亦卽史料學。」（註一二）又有人說：「近代歐洲的歷史學，也可以說只是史料學。」又說：「一分材料，出一分貨，十分材料，出十分貨，沒有材料，卻不能烏煙瘴氣的亂說。」（註一三）這話說的也許稍微過火了一點。

但「史學雖不是史料的單純的排列，史學卻離不開史料。理論雖不是史料的單純排列可以產生，理論並不是儘原形一擺，就算成功了的。方法雖不是單純把材料排列，方法卻不能離開史料獨立的發揮功用的。」「把方法當結論，不獨不是正確的結論，並且不是正確的方法。」（註一四）

三十年來釋古的新史學派，由草創，概說，研究，論戰，終於又走到搜討的時期。最重要的學者，像郭沫若，自從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後，終又從事於甲骨金文

等史料的專題研究。都說明了儘管有正確的觀點和方法，如果引用的材料不正確，一樣是枉費功夫，得不到正確的結論。

儘管釋古學是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大潮流，但疑古學和考古學，關於史料的鑒定和開發，也有極大的成就。說疑古考古並非史學的最終目的，可以。說史學的探討，可以不經過疑古考古的基礎和訓練，或者不需要使用疑古考古的成就和方法，那就錯了。

四 典籍史料的真偽和年代

談到古書的辨偽，不能不追溯到孔子一個名叫子貢的學生，他說：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，皆歸焉。」（註一五）先秦諸子，像墨子，孟子，荀子，韓非子，淮南子，大體都曾辨過堯，舜，禹，湯，儒，墨禪讓傳說之不可全信。（註一六）在漢代最富於疑古精神的，前有司馬遷，後有王充。唐代有柳宗元，劉知幾。北宋有司馬光，歐陽修，蘇軾，王安石。南宋有鄭樵，程大昌，朱熹，葉適，洪邁，唐仲友，趙汝談，高似孫，晁公武，黃震，吳棫，陳振孫，王柏，王應麟，趙汝樸。元有吳澄。明有宋濂，方孝儒，梅鷟，焦竑，王世貞，胡應麟。清有閻若璩，惠棟，胡渭，萬斯同，萬斯大，孫志祖，范家相，劉逢祿，魏源，姚際恆，崔述。現代則有康有爲，崔適，夏曾祐，梁啟超。到胡適，錢玄同，傅斯年以至顧頡剛的古史辨，才有了更大的成績。

現代疑古學最大的貢獻，一個是康有爲的「託古改制的古史觀」，一個是顧頡剛的「層累造成的古史觀」。疑古學說，固然也有一些偏向。但這一條追求真理的科學

道路是不錯的。(註一七)

疑古的潮流，遠在十多年以前，早就成了尾聲了。雖然現在我們不必再專朝那條路上走，但前人所作大部分的成績，我們必須批判的接受和學習。

辨偽的階段，現在已經進到「古籍的新證」和「疑古的糾矯」了。過去疑古學者不但辨出了偽書，並且真書的時代，也往往懷疑，而儘量拉後。現在則從甲骨金文與以證明，考出有的材料，時代並不太晚。像王國維的古史新證，唐蘭的古籍新證，和于省吾的尚書新證，詩經新證，易經新證，諸子新證，都是這方面的好書。尚書堯典一篇，過去顧頡剛以爲作於漢武帝時，(註一八)現在則據竺可楨的研究，堯典裏的「四仲中星」實爲周初的現象。(註一九)唐蘭(註二〇)董作賓(註二一)都以爲堯典紀日方法，和殷卜辭相同。胡厚宣更以爲堯典星名祭名不特和殷卜辭相合，而且堯典有整套的四方風名，亦見於殷卜辭和山海經中。(註二二)

辨偽的現階段，已經由辨別偽書，進到鑒定真書的著作時期，又由時代的過晚，進到其中也有早期的成分。如果我們到今天還不知道中國古代史料，有所謂真偽之分，真書之中，撰著時代也有先後之別，那就未免落後了。

譬如古文尚書，經過了宋，元，明，清四個朝代許多學者的考證，證明是齊，梁之間才出來的偽書，這已早就不成問題。但，在解放後出版的古史研究著作，有的還在大量的引用偽古文尚書，武成，泰誓等篇，以論證商代的歷史。

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，」兩千五百年以前的子貢，就這樣說了。顧頡剛在一九二四年發表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一文，（註二三）證明紂的罪惡，在真的周人的今文尚書中，不過極普通的六點，戰國的書中，增加了二十七事，西漢的書中增加了二十三事，東漢時增加了一事，東晉時又增加了十三事，於是商紂就變成一個亘古未有的殘忍暴君了。惟這種「層累造成」，「後來居上」的誇大的偽說，究竟不可憑信。所以近來有很多學者若明義士，（註二四）郭沫若，（註二五）董作賓，（註二六）吳其昌（註二七）等，反而說商紂不但不是那樣的荒唐墮落，並且終不失為一個英武的君王。但在有的書中，爲了證明商紂這個「歷史上天字第一號的專制魔王」和「黑心腸的狐狸精女妖怪姐己」的慘酷不人道的暴行，卻大批引用起這些漢代及漢以後的靠不住的史料。

關於周易，有卦，爻辭和十翼之分。其纂著時代，前

人討論的已經很多，主要的俱見一九三一年顧頡剛編的古史辨第三冊。一九三四年郭沫若又作周易之構成時代，先在日本寫成，繼在商務印書館出版，又收入他的今昔集，今昔蒲劍和青銅時代各書。他定卦，爻辭是戰國初年楚人馯臂子弓所作，十翼則成於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以後荀子門徒楚國人之手。但，有一些研究新史學的朋友，講商代的歷史，主要的材料，卻根據易經，甚至大量的引用易繫辭。有的還相信八卦是伏羲所畫，繫辭作於文王周公。甚至說「八卦是殷代物質多元論的本體論思想」，說「八卦是殷代的樸素的自然哲學」。不知易十翼非孔子所作，在宋朝的歐陽修（註二八）和趙汝談，（註二九）葉適（註三〇）早已辨別明白了。

史記紀年，始於周厲王時的共和元年，即公元前八四一年。這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紀年之始。在這年以前，直到今天，因為材料的所限，還不能夠解決。所以周代總共的年數，普通有八二八，八六七，八〇二，八六一，七九六，八一〇，八一一，七七五等八種說法。共和以前西周的年數，有二四二，二八一，二一六，二七五，二一〇，二二四，二二五，一八九等八種說法。商代總共的年數，普通有六〇〇，四九六，四五八，六二九，五七六，六〇〇餘，五〇〇